

1976年，在50WGM1南侧发掘出191座祭祀坑，被完全破坏、尸骨无存的有22座，局部被破坏的有21座。这次发表的信息稍微多一些，可以据此了解商代王陵祭祀的一些细节。¹⁸

一，这些祭祀坑分两种：一种南北朝向，占大多数，埋的是斩首的青年男性；另一种，东西朝向，埋的主要是全尸的青年女子和幼儿。从叠压次序来看，东西向祭祀坑要晚一些。根据坑中器物，发掘者推测，南北向坑是武丁王时期的，东西向坑是武丁的儿子祖庚和祖甲，甚至祖甲之子康辛王时期的。总的来说，这些祭祀坑的使用时间跨度近百年。

二，在甲骨卜辞中，砍头献祭多称为“伐二 这是商王献祭时使用最多的方式。就发掘的南北向祭祀坑看，多数砍得颇为草率，“有些人的颈椎上还残留有下颞骨，或上颞骨。在有的下颞骨上亦可以看到刀砍的痕迹”。1959年发掘的祭祀坑也有这种现象：“人骨架……存上下颞骨，牙齿俱存，斩杀时惨状可想！”¹，在砍头之前，有些人牲可能经历过虐杀：“有的骨架上肢骨或下肢骨被砍，有的人架手指被砍去，有的人架脚趾被砍去，还有的人被腰斩……M161内埋奴隶遗骨八具，头皆被砍去，而且大部分手指和脚趾被砍去。”

三，还有些人牲甚至被肢解。甲骨卜辞中有战祭，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剖腹取肠、剁开肢体的祭祀。²此外，还有“岁”（𠂔）祭，甲骨文字形是用斧钺剁开肉块，也是一种肢解献祭。所以，一些祭祀坑中填满了被分尸后的残骨。比如，M141，乱骨“重叠三四层，堆积高达1米”，应当包含数十人；M137，有四具肢解后的残骨，有的骨头有刀痕，似经历过剥皮剔骨等操作，此外还有人牙四颗、狗牙五颗和猪牙三颗，发掘者推测，可能有些人牲是和猪狗一起被屠剥、烹食和献祭的。

四，在稍晚的东西向祭祀坑中，人牲主要是青年女子和幼儿，大多被捆绑活埋，很多人保持着挣扎的姿势。少数坑也混杂被斩首的男子。个别坑以埋葬器物为主，如M229，埋有大小铜鼎两件，铜斗一件，陶器两件，以及两腿被绑、俯身活埋的幼童尸骨一具。

五，上述这些祭祀坑中，只有极少数有“随葬品”，主要是一些随身佩戴的小件玉饰，如玉簪和玉鱼，说明个别人牲并非赤贫的战俘或奴隶。其中，在八名有较高级饰物的人牲中，属于早期南北向坑的两座，晚期东西向坑的六座。这样看来，好像武丁朝后用相对有些身份和财产的女性献祭的现象增加了。但这种区别未必是祭祀礼仪的变化，毕竟1976年发掘区面积和样本有限，并不能代表总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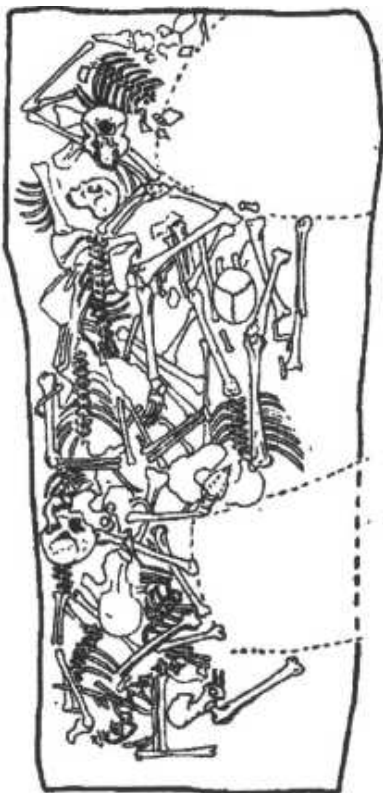
六，经统计，这191座祭祀坑共埋有尸骨1178具，但这并不是完整数字，除了有些坑被破坏，还因1976年的发掘比较仓促，统计有疏漏。2013年，考古队再次挖开了当年发掘过的三座祭祀坑（M57、M58和M208），原报告中，这三座坑分别埋有六人、八人和七人，但经过重新核对，每座坑均埋有十人。²¹按照这种漏计比例，1976年发掘的尸骨总数会达到1683具，减去22座完全被破坏的坑，按169座统计（包含21座被局部破坏的），则平均每座坑内大约埋葬十名人牲。此外，王陵区有些地段还没有进行探查，而且很多坑已被农业活动平毁。1976年发掘时，考古队从村民中调查得知，以往该地棉田内时常挖出成堆掩埋的人头骨。这应当是无意中挖毁的祭祀坑。

七，按位置和尺寸，1976年发掘的这191座祭祀坑可分为22组，每组代表一次单独的祭祀活动。坑数最多的一组有47座，最少的有一座。照此计算，则平均每次献祭挖坑8.7座。目前，王陵区已经发现祭祀坑约2200座，按上述规模计算，应当有253组，恰好和殷墟王陵区的使用时间接近，照此推测，王陵区大概平均每年会举行一次大型祭祀，并埋下一组祭祀坑，如此持续了约两百年。

王陵区祭祀坑内埋的并不都是人牲，还有少数“牲祭坑”。1978年，祭祀区南侧发掘出40座祭祀坑，其中，有30座埋马117匹，有五座各埋一人，还有五座埋的是各种家畜和兽类，除了猪狗牛羊，还有亚洲象、狐狸、琳猴和河狸。22牲祭坑排列严整，各种动物的摆放也非常整齐规范，甚至有种美感。其中，亚洲象很年幼，尚未长出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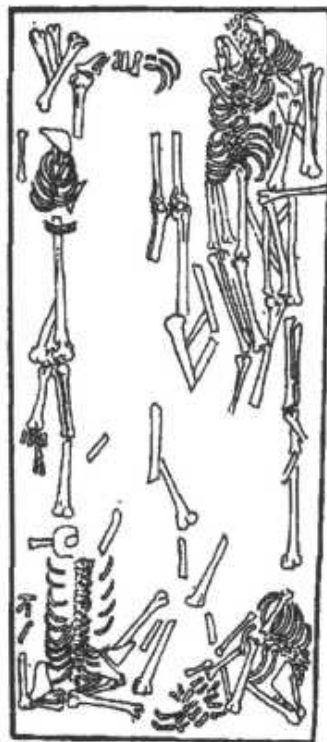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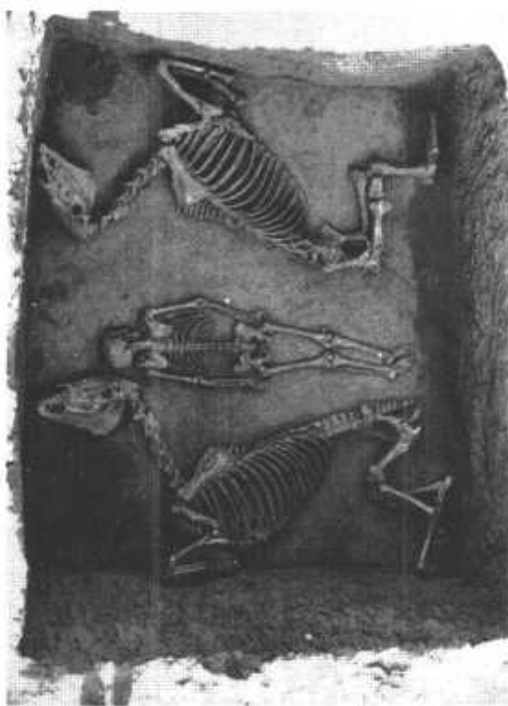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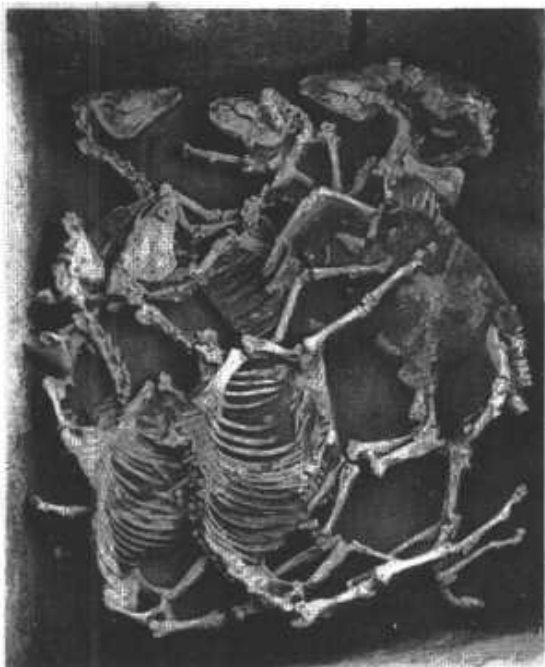
5



? . 一 , , 1.米

1. M26
2. M1
3. M39
4. M161
5. M6
6. M139

部分祭祀坑平面图



1978 年发掘的马坑和象坑²³



门齿，背部有一枚铜铃，显然是人工养殖的。在它的前方坑角，摆放的是一头幼猪，大小相对，构图感很强。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猪狗牛羊属于商王奉献给先祖的食物，马和各种野生动物是

给先祖的生活用品和玩物。比如，1976年发掘的一座坑中，就埋有一人和五只鹰，这应当是把驯鹰师和鹰都献给了先王和先妣。

砍头的认真程度

王陵大约二十年左右增加一座，祭祀坑则每年都会增加。虽然王陵中的殉人和祭祀坑中的人牲大都被砍头，但这两者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区别。

如前所述，王陵墓穴中的人头骨多数连着几节颈椎骨，说明屠杀时有人专门负责拽住人牲的头发，使其脖子伸长受刃。

这种杀祭方式在甲骨文中专门的字，除了“伐二还有一个字：𠂔，写作学界普遍认为，该字象一人双手反缚，发辫直竖，一把斧钺正砍杀人头之形。²⁴有些甲骨卜辞的𠂔，人头上还会画一只手，写作,表示砍头时有人用手拽着受刑人的头发。²⁵

把头发编成束状的用途很明确，显然是为了防止人牲缩脖子。伐是用普通的戈砍头，𠂔则是用尊贵的钺，所以砍头的过程也更认真，有可能是由王或王后等领袖人物亲自执行。

王陵墓道中摆放着比较完整的人头，以示对刚去世的先王的尊重。这是孝子的人之常情。至于每年向历代先祖的献祭，就没有这么讲究和投入了：祭祀坑中的无头尸身，往往连带着下颚甚至上颚骨，说明每年例行的祭祀的随意性更大。

殷商的王陵祭祀对男性人牲和殉人多用斩首，甚至肢解，而女性则多能保存全尸。这背后的宗教思维可能是：男性俘虏和奴隶具有反抗能力，砍头可以使其灵魂彻底驯服；相对而言，女性奴隶和战俘则缺少攻击性，甚至也有给男性先王和诸神充当性奴之用，自然需要保

存全尸。当然，性别不全是区分用途的标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人牲（殉人），都可能被肢解、剔剥，甚至烹饪加工。

殷墟宫殿区发现近千名人牲，王陵区则有上万，这说明商王室献祭的主要场所是王陵区。而目前在早商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以及中商的小双桥遗址尚未发现王陵区，这意味着它们的大规模献祭区可能还未被发现。

早商和中商宫殿区的献祭人牲，头骨经常被锐器戳出孔洞，但到殷商时期，这种现象已经很少见。这是祭祀方式的重要转变。

甲骨卜辞中记录的很多祭祀现象，在考古中还难以找到对应。比如，“沉”祭，是指把祭品投入河中，祈求河神的庇护，自然难以留下考古现场；还有用血或内脏献祭的字，但它们也不可能在地层中保留下来；几乎没有用马献祭的记录，但祭祀场中却有数以百计的马牲，这也是考古和卜辞不能对应的地方。

以上是商王室的人祭和人殉。而王室之下，还有为数众多的贵族，他们的人祭和人殉虽然不如王室集中，但分布范围更广，随时代升级 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附录一：人髓骨占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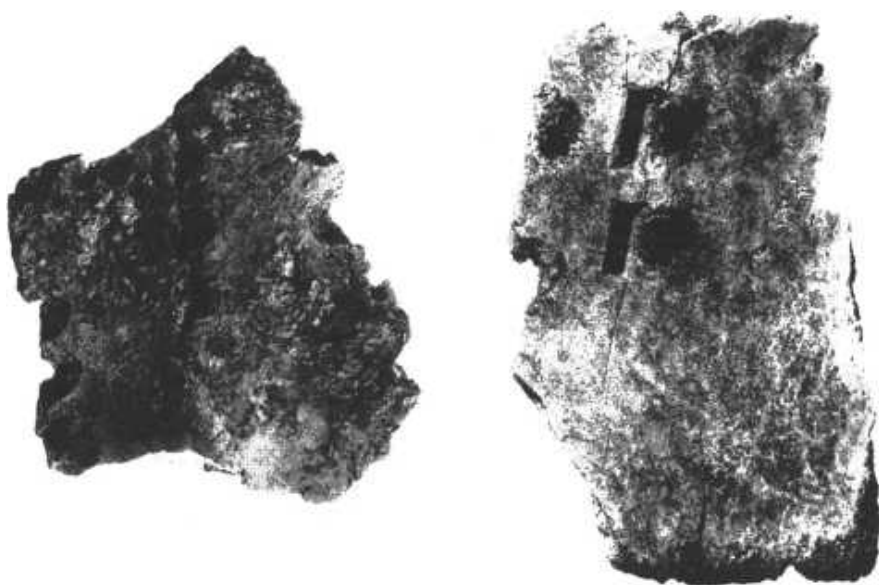
从考古来看，在盘庚迁都前，殷地已是一座比较繁荣的商人聚落， 不仅有随葬铜礼器的墓葬，还有超过200平方米的夯土建筑。

发现两座早于盘庚时期的庭院建筑（分别编号为F1和F2 ），其中， F1有奠基人七名，F2则至少有五名（发掘不完整）；主要是幼儿，超 过一岁的，腿或下半身会被砍掉。F2东侧还有一座祭祀坑，里面有 两具尸骨和一枚头骨，与散乱的红烧土块堆积在一起。26这

是典型的 商人宗教遗存，所以，对于盘庚朝廷来说，殷并非陌生的化外之地。

在殷都早期以及宫殿区从退北迁到洹南的前后，商人似乎尝试过一些奇异的占卜方式。在洹南宫殿区南方1公里处的苗圃北地遗址，发掘出一些这个时期的灰坑，其中有各种动物和人的零碎骨头。一期的H19有大量占卜用牛肩胛骨和六块人髓骨残片，而且人髓骨被钻凿出圆坑和长方形坑，还有灼烫之后的裂纹。显然，这是操作者在尝试用人骨预测的准确性。

在H19及旁边的灰坑一共发现150多块人骨，大都是残碎的， 有髓骨、臼骨、脊骨、肢骨、颅骨和颞骨等，占兽骨总量的十分之一。这片区域有可能是座骨器作坊，H19则是一位占卜师的工作地点，他应该就住在作坊旁边，以方便拣选、加工和实验各种骨头占卜的准确性。制骨的下脚料则被扔到了灰坑之中。人骨的预言效果似乎不如牛骨，所以并没有普及开来。再以后，商人用龟甲占卜的现象明显增多， 这应当也是商人反复试错之后的收获。27



殷墟苗圃北地的人髓骨卜骨碎片28

附录二：第一颗蒸锅人头

1984年，考古队又一次发掘了几座殷墟王陵区的墓葬，包括曾经被盗出过“司母戊方鼎”的M260——它可能是武丁王的一位夫人“妇 娣”的墓。

这座大墓旁边，还有些相对较小的贵族墓葬。这些墓主应当是王室近亲，所以获准埋葬在王陵区。其中的M259，从地层和随葬器物看，属于殷墟二期，约在武丁王中晚年。

M259墓室内的二层台上有一具儿童尸骨，头被砍下，压在自己身下；沿着东西两侧的二层台，顺序摆放成年人头骨14枚，其中一枚盛放在铜蹴（蒸锅）内，铜期是躺倒的，局部被压扁，可能是木椁室塌陷所致；墓室脚端的二层台上有牛腿等食品。此外，墓穴填土过程中还杀了一人埋入。

人头骨所属的躯体不在墓穴内，可能因为墓穴面积有限，便在墓穴两侧各挖了一座坑：东侧坑埋无头骨架六具，西侧坑埋八具，正好和墓穴内的14枚头骨对应。²⁹

铜羴是蒸食物的炊器，里面的人头会不会是被作为食物蒸熟的？在当时，考古工作者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直到十几年后，在另一座殷墟贵族墓葬也发现了铜羴人头组合，而且人头所属的躯体就在旁边，人们这才对商朝的人殉行为有了新的认识。



M259出土的铜期和里面的人头

附录三：甲骨卜辞中的献祭人数

胡厚宣先生根据甲骨卜辞统计过殷商诸王的献祭人数。他共找到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片，卜辞1992条，合计共献祭13052人。此外，还有1145条人祭卜辞未记载人数，即便按最少一人计算，甲骨卜辞记载的献祭总人数也会超过1.4万。

按卜辞所属时代划分，殷商各期的人祭数量是：

一，属于武丁王的人祭卜辞1060条，献祭9021人。另有531条卜辞没有记载人数。

二，在武丁之子祖庚（第二十三王）和祖甲（第二十四王）期间，有人祭卜辞ni条，献祭622人。另有57条卜辞未记载人数。

三，在凜辛（第二十五王）、康丁（第二十六王）、武乙（第二十七王）、文丁（第二十八王）期间，有人祭卜辞688条，献祭3205人。另有444条卜辞未记载人数。

四，在最晚期的帝乙（第二十九王）和帝辛（纣王，第三十王）期间， 有人祭卜辞117条，献祭104人。另有56条卜辞未记载人数。
3。

上述统计中，武丁王献祭的人数最多，占殷商诸王的69%；不过， 这只是出土甲骨的样本，未必完全代表实际发生人祭的比例。最明显 的是在祖甲、帝乙和帝辛时期，人祭卜辞数量很少，而这很可能是因 为祭祀制度不同造成的。

在武丁等多数商王的时代，王的祭祀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每次献祭之前都要占卜询问献祭的方式和数量是否符合神灵的意旨，这自然会留下大量关于人牲的记录。但祖甲、帝乙和帝辛三王实行的是所谓的“周祭”，方法是按照天干顺序，为所有需要祭祀的先王和先妣制订一年周期的祭祀表，固定每次祭祀的时间和形式，所以卜辞中便不再记载献祭用人和动物的种类与数量。及关于“周祭”到底使用哪些和多少祭品，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结论。

注释

- 1 参见顾颉刚《尚书盘庚三篇校释释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9, 中华书局， 2010 年。
- 2 朱彦民：《殷墟都城探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页。

- 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I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5期。
- 4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10年第1期。
- 5 张国硕：《盘庚迁都来龙去脉之推断》，《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 6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I号基址发掘简报》。
- 7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 8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队：《1987年安阳小屯村东北地的发掘》，《考古》1989年第10期。

- 9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石璋如：《北

组墓葬》（1970年）、《中组墓葬》（1972年）、《南组墓葬附北组墓补遗》（1972年）、《乙区基址上下的墓葬》（1976年），均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出版。

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11石璋如：《殷墟建筑遗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59年；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年。

1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13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T550号大墓》，（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76年，第25页。

14以上详见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15 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 1550号大墓》。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墓穴中央挖有方形墓室（椁室），二层台上有大量殉人尸骨，这些尸骨在底片上进行了描色以便观察。

17图片来自“中研院”史语所。

18 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 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第1期。以下引用该报告的文字和图片 不再单独注明出处。

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第45页。

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88、97页。

唐际根、汤毓赞：《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 文物》2014年第3期。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 第 12 期。

同上。

于省吾先生认为，“奚”字“象人的顶部，发辫直竖，用手捉之”，而“皃是从戌奚声的形声字，系用斧钺以斫断奚头，是杀戮之意”。参见于省吾《殷 代的奚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1期；胡留元、冯卓慧《夏商西周法制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8页。

姚孝遂：《商代的俘虏》，《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371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泡北商城花园庄东 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同上。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5-166页。胡厚宣还划分出了武丁之前的三位商王盘庚、小乙和小辛的卜辞，也有少量人祭记录，共100人。但殷墟卜辞的时代划分尚未有公认的完整方案，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中没有早于武丁的，这些卜辞应属于武丁及之后。

学者董作宾的《殷历谱》首先提出了祖甲、帝乙、帝辛时期的周祭现象，他称之为殷商的“新派宗教”。另参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7—467页。

第十一章 商人的思维与国家

商王朝留下了众多遗址、文物以及累累白骨，那么，这个身居华夏文明源头的王朝是如何运作的？商王如何解释自己的权力来源？他的臣民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商朝已经有了文字，即使按最严格的“文明”标准，它也完全符合。商代甲骨文和后世的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自然会给现代人释读甲骨文带来天然的便利，但也会有误导，容易让现代人以为商朝的文化和政体很容易理解。其实，它和西周之后的华夏文明很不一样，和战国之后的中国更是判若云泥。

假设一位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如孟子或者荀子，亲身访问商朝，其所见所闻将会彻底颠覆那些从史书中获得的认识。现代考古学也只是揭开了真实商代的一个小角，不仅如此，如何解读考古发现甚至复原真正的商文化，却是更加困难的工作。

冷酷而暴力的世界观

殷墟虽然出土了十多万片甲骨卜辞，但它们都是商王针对特定问题的占卜记录，并没有宏观的自我陈述。相对而言，《尚书·盘庚》记载的盘庚王的迁都讲话在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盘庚的讲话中，频频出现“德”字，似乎商人已经有了一整套道德观念。其实，商人的“德”和后世的意思还不太一样，它不是客观的行为规范，而是具体的“给好处”之意。王的“德”是给臣民好处，它的反义词是惩戒，是“罪”和“罚”，两手都

不可少：“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直到周公在西周初期发展出“敬德”的理念，“德”才逐渐被当作一种通行的价值观。

在商人的眼里，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他们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本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自然也不会想象鬼神能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时、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大到灾荒和战乱，小到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都有鬼神在背后操纵，即便是商王也难免。

为获得鬼神的恩宠，或者不降祸，商王一直在向鬼神奉献大量祭品。但这仍不能保证有效。在甲骨卜辞中，商王频频占卜询问：“帝其降我旱？帝弗害年？唯帝令作我祸？唯帝肇王疾？帝其作我孽？”翻译成白话就是，上帝最近会不会降下旱灾？会不会损害年成？上帝会不会保佑我？会不会让某个异邦起兵攻击我？会不会让我生病？

除了上帝和大大小小的自然神，直接影响商王生活的是天界的列祖列宗。但凡商王有任何不适，包括牙痛、耳鸣或者噩梦，都要先预判是哪位先王或先妣在作祟，然后用占卜确认，并决定举行哪种祭祀，以消弭祖先祖神的愤怒。

上帝和先王不仅需要人牲在内的各种祭品，还垂涎着世间的活人，包括商王的夫人。武丁王最倚重夫人妇好，但她不幸早逝，于是武丁王占卜询问：“是上帝要娶妇好吗？还是唐（商汤）、大甲、祖乙、父乙（武丁之父小乙）要娶妇好？”

最后，占卜的结果刻在了甲骨背面，但似乎并不是上面列举的几位，而是商族建立王朝之前的第八代酋长上甲微。²




惟帝取妇好？（《合集》2637）


惟祖乙取妇？惟父乙？（《库》1020）



惟唐取妇好？惟大甲取妇？惟祖乙取妇？妇好有取上。王占

曰：上惟甲。（《合集》2636）



商人对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表现在他们创造的甲骨文里。甲骨文里最常见的是和杀人有关的字，其意思不仅是杀戮，更是仪式化的杀人献祭。


戈，是商人使用最多的兵器，甲骨文写作。而以戈为部首，又有一系列会意字，如伐，甲骨文写作，在甲骨卜辞中出现极多。用戈砍一个人，是伐；砍两个人（象征多个），则是“𠂔”甲骨文写作，至今繁体的“癩”字还保留着原字形。殷墟祭祀区出土的大量身首分离的尸骨，大都是伐祭的遗留。





殷商的人祭多用羌人，可能是为书写方便，占卜师甚至给“伐羌”专门造了一个字，甲骨文写作，字形是用戈砍一名羌人。


职务的“职”，甲骨文写作，隶定为，繁体的“蹄”即从此来。广的字形是“戈”+“石”，显然，石头是磨砺戈刃用的。在卜辞中，这个字的意思是等待的待，因为磨砺戈是为了砍杀，本身就是个需要等待的过程。卜辞中经常出现“战，亡尤”，意

为“等一等,不用担心”。由此,又引申为“职务”的“职”字,因为职务本身也是待命状态。

戍, 甲骨文写作, 像一个人扛着戈, 代表出征和戍卫。戎, 甲骨文写作, 是“戈”和“盾”两个字的组合, 意为战争。西部周族语言中的“戎”字有野蛮人之意, 如“戎狄”, 被后世一直沿用, 但商族人的戎字本无此意。

翦, 甲骨文写作, 像一撮羽毛装饰刃部的戈, 意为攻占和普遍性的杀戮。羽毛的意义不详, 也许商人崇拜鸟, 就将鸟羽作为神圣的标志。但在甲骨卜辞里, 不仅有商人“翦”别族, 蛮族也可以“翦”商的城邑。后来的周人史诗把他们的灭商事业称为“翦商”, 也是取其宏大之意。

除了大量“戈”部的字, 类似兵器造型的还有天干的“戊”, 甲骨文写作; 地支的“戌二”甲骨文写作; 甚至第一人称的“我”, 甲骨文也是写作。由此, 便又造出一些常用字, 如岁(戩)、义(羲)、咸、成等, 其本意是什么已经很难判断, 但肯定都和杀伐有关。甲骨文的“王”字, 甲骨文作, 一把战斧(钺)的刃部, 象征军事征伐是王专有的权力。³

除了对敌人(外族)的杀伐, 在商人自己的生活里也不乏暴力。如“教”字, 甲骨文写作: 右边是攴, 手拿一根棍子; 左上是“爻”, 一种用摆放草棍计数的方式; 下面是“子”, 也就是幼儿。顾名思义, 用棍子督促孩子学习算数, 就是教。爻字可能让人联想到八卦, 不过早期的爻还没有八卦占算之意, 只是单纯的算数, 但更晚的八卦的确是从草棍算数发展来的。

手拿棍子的部首，不仅有“攴”，还有“攴、都表示威胁和驱赶 之意。此外，还有手拿战锤的“殳”部，写作4，比如甲骨文𠂔，就 是一种用棍棒击打人牲头部致死的祭祀方式，在祭祀北风之神时会用：“[北方曰] 伏凰曰用。”（《合集》14294）

甲骨文是标准的“男性文字”，而且是龙山文化之后部落旧习未 褪时代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那时还没有后世人理解的王朝秩序，部 族之间的掠夺和杀戮司空见惯，嗜血的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

当然，甲骨文里也有女人的形象。“女”，甲骨文写作2，像一个 跪坐姿势的女子，以驯服的造型和较大的胸部为特征。手抓一名女子， 则是“妥、甲骨文写作2，一种用女子献祭的方式。“母”，甲骨文 写作4，在女字的胸前加两点，突出其哺乳的特征。

商人称尊贵的女性为“妇”，如著名的商王夫人“妇好”和“妇井”。“妇”字的三部，甲骨文写作*，一把扫地的答帚，即“帚”字，由 此可见商人默认女性的职能是做家务，用答帚即可代表妇女。至于当 时和女人有关的工作，如纺织、缝纫和制衣，在甲骨文里很少有相关 的字，看来它们不属于制造、使用文字的男人（武士）关注的内容。

当然，王的夫人（王后）会很有权势，经常主持战争和祭祀，但 这并不代表商朝总体的性别秩序。

外来技术与殷商中兴

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

双马拉的双轮轻型战车是如何进入商朝，或者说如何进入东亚的，至今还是个历史谜团。这种技术来自五千年前中东地区出现的牛拉、驴拉轮式车辆，以及黑海北岸的草原人驯化的马匹。三千多年前，驾驶着马拉战车的“印欧人”四处扩散，远及南亚次大陆和希腊半岛，比如，古印度梵文史诗或荷马史诗中就曾多次歌颂这种英雄的座驾。

除了驾车，骑马也是快速的交通方式；不过，在距今4000—3000年前，人类还很少有骑马的尝试。这背后的原因很难说清楚，也许有生活习俗的惯性，也许有马匹品种进化的因素，比如，越是古老的葬马坑，马的个头往往越小，可能并不适合长途骑行。在上古时代，马拉双轮战车是唯一可以提升陆地交通速度的工具。

在商代，有些殉马坑中也有殉人，有学者因此推论说，商代已经

有了骑马行为和骑兵。但这种推论未必成立，商人很擅长用象形原理造字，如果商代已经有骑马行为，按理说他们应该会造出人骑马造型的字，但目前发现的甲骨文中完全没有这种字。

和人力车辆、牛拉货车不同，制造双马拖曳且高速奔驰的轻车，需要很高的制造工艺。不仅如此，驯化马和驾车的技术也非常复杂，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发展出来的。战国时期的《庄子》有

“轮扁斲轮”的寓言，说这位工匠制造的车轮可以用于高速马车，可见其技术细节之精妙。

在商代前、中期，从未发现马车的踪迹，只有人力推拉的小型双轮车辙痕。夏-二里头和商代前中期遗址中几乎从未发现马骨。华北北部有些族群遗址中发现过马的骨头，但也只是将捕获的野马作为食物，从没有驯化马的迹象。

到盘庚王迁都殷地后半半个世纪，武丁在位时期，却忽然出现了成熟的双马拖曳双轮战车，比如，殷都宫殿区乙区埋祭了四辆双马拉战车，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墓中有六件驾驭马车用的铜制弓形器，武丁的甲骨卜辞中也频频出现马车。可以说，马车在殷商出现得非常突然，而且似乎从一开始，技术就已经完全成熟。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

也许是某个中东地区的马车族群进入了中亚和蒙古大草原，又南下穿过燕山，在山西或河北地区遇到了商族人，然后，商人迅速掌握了驾驭战车、繁育马匹和制造车辆的技术。另一种比较缓慢但可能性更大的方式，则是马车技术自西向东，在若干个族群之间经历了“接力”式的传播，最终到了商人手里。

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拥有马车的聚落，但在从西伯利亚到中原的漫长之路上，目前还没有发现马车技术传播的中继站点。这些谜团还要留待未来揭开。

中国最早的马车实物和文字记录出现在武丁朝，但这不代表武丁时期是商人引进马车的起点。因为哪怕是技术移植，也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

由此，在武丁 的伯父盘庚王时期，商人应当已经引进马车技术。倘若真是如此，盘 庚北渡迁殷就很可能就是为了更方便地引入和繁育马匹。

在商代，中原的气候比较湿热，本不适合马的繁育，但殷地紧邻 太行山，山间草甸相对高寒，不仅适合养马，而且也更方便从冀北和 晋北草原地区购买马匹。商人虽然习惯的是中原湿地环境，但殷都还 属于他们可以接受的足够靠北的地域，这样，传统的水牛以及新来的 战马均可兼顾。

由此，在殷商早期的石家庄台西商人据点发现的那块马骨，也可 以获得解释：台西商人聚落虽还不够配备马车的资格，却是北方驯化 马匹销往殷都的所经之路，所以不排除个别马匹有可能病死在这里， 从而变成灰坑中的骨头。

殷商阶段，马车还不太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 更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作为通信的手段和王朝上层人物的交通工具。

马车可以加快殷都和数百里外的商人侯国间的信息沟通，而且侯 国的君长们也可以更方便地往返都城，朝见商王。当然，这也有利于 他们保持商族特性，避免因终年僻处一隅而逐渐被异族同化。而且， 驾乘昂贵而罕见的马车奔驰，本身就是一件荣耀之事，不仅能让沿途 的化外异族惊惧，车上的商人贵族也可以获得充足的优越感。这也是 王朝精英认同的一部分。

在具体用途上，依靠马车的快速通信能力，相距上百里的商人军 事据点可以保持有效联络，一旦某个城邑遭到土著部落威

胁，周邻据点可以尽快参战，战报也可以迅速送到殷都，以便后方组织增援力量。马拉战车比徒步快三倍以上，这意味着传递战报和命令的时间只需原来的四分之一，而王朝可以有效管理和及时反应的面积则扩大了不止十倍。

甲骨卜辞就记载过一场使用马拉战车的战争，讲的是武丁对一个叫宙的部族的征讨。

卜辞上说，在癸丑日，一名叫“争”的占卜师为武丁王卜问：从今天到丁巳日，我军（在哪一天适合）攻击宙人？

武丁王解读说：丁巳日不合适，要到下一个甲子日。

十一天之后的甲子日，龟甲刻上了战斗结果：癸亥日，战车没投入战斗，从这天夜里到第二天的甲子日，（可能因为战车投入使用）确实消灭了宙人。

宙地环境应当比较平坦，适合战车奔驰作战。武丁王在占卜中否决了在前面四天进行决战，应该是在等待战车集结。

有学者认为，宙地在山西南部的长治一带，从殷都到这里需要翻过山岭。商人的战车可能需要拆解，然后用马驮运，翻过山岭再组装起来投入战斗，所以商王的主力需要多等待七天。至于这场战斗投入了多少战车，卜辞中没有记载，估计最多有数十辆。

宙应该是个不大的部族，在殷墟卜辞中出现的次数不多。这场战斗可能是武丁王比较集中的一次使用战车的尝试，其卜辞用异常粗大的笔画刻在了一片龟甲的正面，说明武丁王对战事非常

关心——与此同时，武丁可能也在发动对“缶”部族的战争，但相关占卜却只是用 细微小字刻写在“宙”的边缘。二者差别极大。这应当不是因两个敌 对部族的实力区别，而是对战车实验的强调。

武丁王还经常乘马车打猎，比如“逐兜”，也就是追猎野生水牛。

在某次癸巳日，占卜师“骹”为商王卜问：下一旬不会有灾祸吧？武丁王解读说：好像有些不顺利。第二天甲午日，武丁去捕猎野水牛，一名“小臣”（王的私家奴仆）为王驾驶马车，结果，奔驰中王的车 撞到了一块石头，车轴被撞断了，整辆车都翻了，武丁的一位亲戚、重臣“子央”也从车上摔了下来。王和子央可能不是乘坐同一辆车。

这起事故超出了占卜预测的结果，被补刻在了前一天的卜辞后面。目前发现的甲骨卜辞中，关于马车的记载主要属于武丁王，但这



《合集》6384正

癸丑卜，争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翦（武）宙？王占曰：丁巳我毋其翦（我），于来甲子翦（我）。旬有一日癸亥，车弗翦

（茂）。之夕向甲子，允翦（比）。



《合集》10405记载的武丁王马车事故

癸巳卜，骹鼎（贞）：旬亡祸？王（占）曰：乃兹亦有咎，若储。甲午，王往逐兜，小臣叶车马，磁，奥（坏）王车，子央

亦坠。

不等于武丁时期使用马车次数最多。从考古发掘可见，武丁之后，马车数量一直在增长，到殷商晚期，车马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武丁时期，不仅王室祭祀、殉葬要埋车马，殷都内外越来越多的商人贵族也开始流行殉葬车马。

因此，殷商晚期能够投入作战的马车数量应该已经远超武丁王时期，可能达到数百辆规模。至于为什么武丁之后的甲骨卜辞中少见马车记载，很可能是出土甲骨数量不均衡所致：武丁时期的甲骨侥幸保存下来的较多，后世诸王的则较少，这是考古工作难以避免的偶然性。

大约和盘庚王迁往殷都同时，在中东地区，古埃及和古赫梯两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战——卡迭石战役，双方投入的马拉战车均超过一千辆。这次战役被古埃及文和赫梯人的楔形文字记录了下来。两相比较，商代的战车数量应该还达不到这种规模。

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族”

商王的权力来自神界，貌似对人间的一切都有生杀予夺之权，但现实呈现得更为复杂。

早商时代的考古资料较少，文献史书又不可靠，直到发掘出垣曲和偃师商城的巨大仓储建筑群，我们才得以窥见早商王朝巨大的控制力。至于这种控制力是如何实现的，目前还无法回答。

经历衰落和模糊不清的中商后，晚商殷墟时代的信息开始多了起来。殷墟没有发现早商那种超级仓储建筑群，从甲骨卜辞等各种材料来看，殷商并没有现代人熟悉的各种政府体系，如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层级政府等。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血缘关系的“族”，甲骨文写作𠂔，字形是战旗和一支箭，直观表现了它的战争属性。商人的族，可以理解成宗族、部族或氏族，每个商人宗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统治着耕作的土著农民。

每个族有自己的“邑”，即农业居民点。相对而言，在殷都范围内，因为人多地少，族邑很密集。邑未必有级别高低的统属关系，商王都城虽然称为“大邑商”，但在字面上也只是个较大的邑而已。

那些都城之外的部族可能占地数十里，算得上一个小邦国，它们的主人（族长）可能有“侯”的爵位，统治区就是侯国。“侯”，甲骨文写作𠂔，望楼下面的一支箭，意为担任警戒任务的哨所，所以分封在边地、保卫商朝的部族首领就是侯。在甲骨文里，侯只能是商族人，投靠商朝的异族方国首领不可能被称为侯。只是商朝以后的人已经不了解这种分别。

商人的族不仅是血缘家族，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有自己的家族武装力量，还可以有畜牧业、渔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些族的某种产业较为发达，如铸铜或制骨，或者贩运某些商品，但他们仍有自己的农庄产业，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

从神权法理上说，商王可以剥夺任何一个族长的土地和属民，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极少，除非该族长有明显的罪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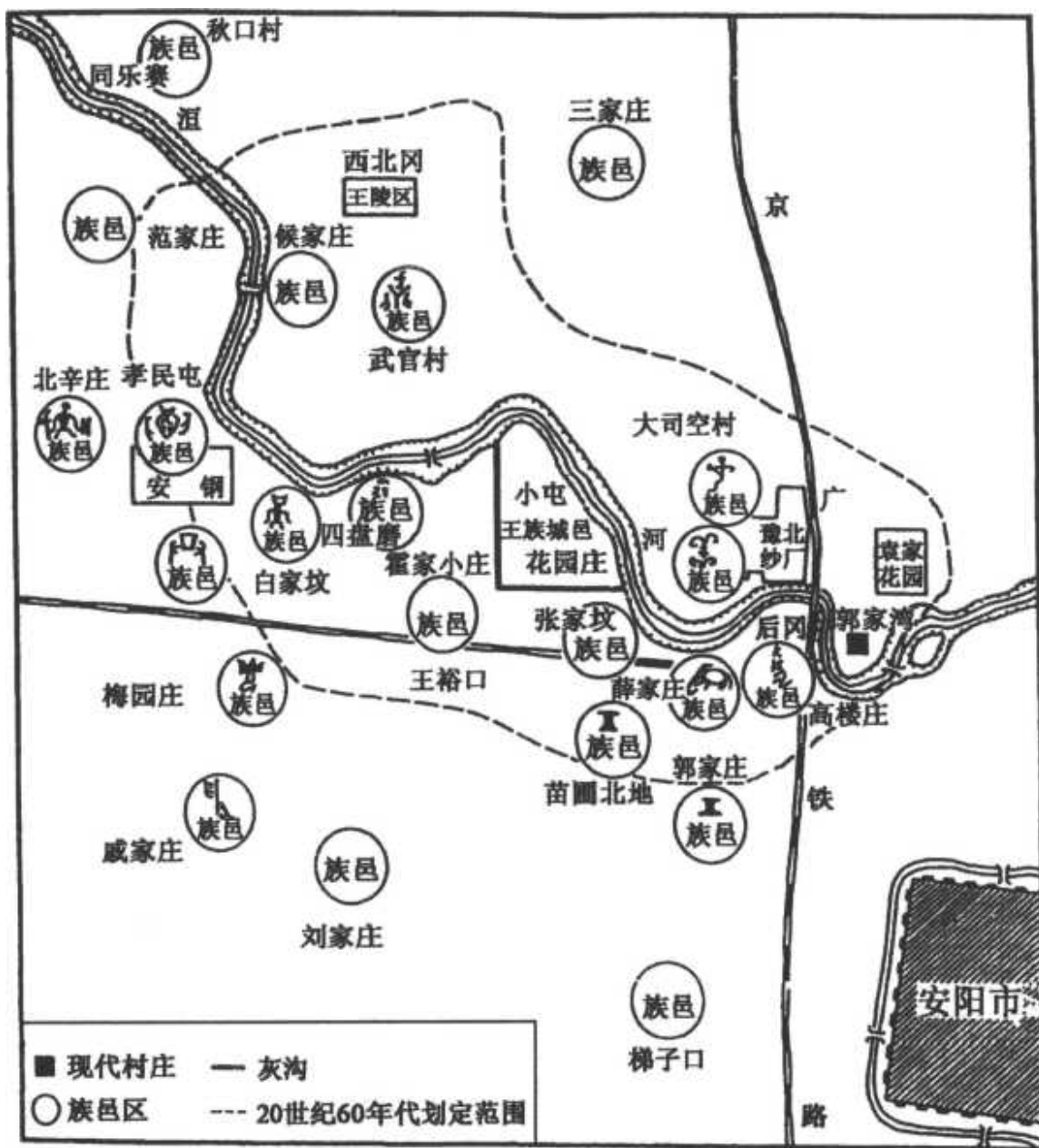
商人生活中，传统习惯法很重要，王不能随意介入各部族的事务。

有些族是历代商王的王子们繁衍出来的，由此获得一块封地和上面的农夫，或者是从王室直辖区分割出来的，或者是新征服的，从而建立自己的族邑。

还有些族更古老，在商朝开国之前或者在灭夏的过程中，和商汤王建立了同盟或依附关系，从而在商朝建立后，被吸纳、同化到广义的商族之中。从商初考古来看，当时的加盟者非常多元，分别来自岳石、下七垣、辉卫等文化。在殷墟时代的卜辞中，商王会祭祀一些来自商王家族之外的“大臣”，如伊尹、巫咸、黄尹，这些人应当是早期加盟商族的各部落酋长。随着商王家族繁衍得越来越多，这些老资格的加盟族也就变得疏远了，但仍属于商的政治和文化圈。

商人的族在历史文献里的记载很少，但在考古发现里很多。比如，商王的甲骨卜辞经常会命令某个人去外地征战，却没有说拨给他多少兵力，说明此人是族长（侯国之君），理应带自己的家族武装出征，不需要专门写出。

卜辞里常出现“多子族”出征的记载，“子”特指商王家族的子弟，“多”是众多之意。王族子弟是和商王亲缘最近的，所以他们的家族武装也比较好。不过，一位王子繁衍几代之后，会形成一支独立的族，



殷墟范围内的各族邑分布图，圆圈中的族邑符号来自出土青铜器上的“族徽”



bb

商代青铜器上的部分族徽符号

就不再属于“多子族”序列了。

商代贵族重视青铜器，有些礼器和兵器上会铸造主人的名字或宗族图腾（族徽）。一旦家族繁衍扩大，往往会分成几个不同的家支，从而族徽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比如，加上一些小符号以区别。

商人以族为基本社会单元，这在墓地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所谓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族墓地一般排列有序，族长与同族成员葬在一起，位于靠前或居中较尊贵的位置，一般不会脱离族人单独埋葬。男性族人往往有兵器随葬。族墓地的成员，虽然彼此之间贫富差距可能较大，但都享有同一块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也往往有同样的族徽。那些被统治的农奴不可能葬入主人家族的墓地，除非作为殉葬人。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商人的“族”有很大的独立性和世袭性。有些外地的族也是侯国，这属于“分封制”或“封建制”的社会规则。其基础原理是，因社会发展程度低，交通和通信手段落后，很难采用官僚制的直接管理方式，故而王权只能承认各商人部族或家族世袭的权力结构，遵循传统习惯法中的权利和义务原则。商文化有残暴血腥的一面，但内部的社会又是分权运行的。

王权与家族分封制

由于社会以族为基本单位，没有完备的政府体系，也就没有赋税和兵役制度。殷商王室和朝廷的开支不是靠在王朝境内普遍征税，而是由王室自己的产业承担。贵族们会向商王进献各种物品和人员，但没有量化要求。甲骨卜辞中有各种贵族向商王进献的记录，如牛、羊、犬、战俘、奴隶、玉石、甲骨、贝和盐（卤）等，但从未提及有额定的赋税指标。

这种规则之下，商王需要直接管理的王朝事务比较少，其最重要的事务是组织祭祀和战争，而商人各宗族则承担提供祭祀贡

品和战争 兵员（自带装备）的任务。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正是家 族分封制而非官僚帝制时代的规则。

甲骨卜辞对祭祀的记载都很简单，一般只记载王的参与，很少记 载其他的参加者。但在实际操作中，在殷都的相关宗族应当都会有代 表出席。比如，祭祀某位先王时，这位先王后人形成的各宗族应该都 要派代表并携带祭品参加。越是祭祀古老的先王，参与者就越多。祭 祀商王家族之外的先代人物，或者河、岳等自然神，相关部族应该也 会派员参加。

一旦发生战争，商王会直接命令某个或某几个宗族参战，有时 则会集结编组。比如，“登旅万”⁶，意思是召集一万人的军队，这应 当是先确定需要的兵力总数，然后向各宗族分摊兵员。有时还要编组 成三个支队，所谓“王做三师，左中右” 从春秋时代的战事来看， 各家贵族的武装不会被打散，只是被编组到更大的作战单位中。各宗 族参战，既是对王的义务，也是抢掠战利品和人口的机会。

因为没有税收体系，所以商王的宫廷开支主要靠王室自己的产 业。商王拥有很多邑（田庄），由王任命的管家（小臣）经营，收获 物属于王室私产。这些王家田庄可能分布在殷都附近，乃至周边数十、 上百里内。殷墟卜辞中经常有祈祷风调雨顺的内容，这应该主要是 商王在关注自家田庄的收成。

商王也有放牧牛羊的牧场。牧工“𠂔”多是战争中捕获的奴隶， 常有逃亡的记录。王家的邑设有粮库（鹿），商王时常会派人视察。 王宫内还有铸铜作坊，但规模不如宫外的大。关于商王

的田庄如何经营，虽然甲骨卜辞中有些王命令众人耕作和开垦的记录，但更细致的管理工作应该是由基层小吏来做的。

殷墟的考古还提供了一些颇难解释的现象。比如，商王宫殿里储存着大量的石头农具。在甲九宫殿基址旁边的窖穴E181中，出土收割用的石刀444件；⁸此外，宫殿区的“大连坑”中有石刀过千，石镰也有多处集中出土，共3640件。⁹这些石刀和石镰应是集体保存的农具，多有使用磨损痕迹，使用人可能是王室蓄养的奴隶。也就是说，这些人连属于自己的农具都没有，生存状况接近家畜。

E181窖穴的埋藏物极多，除了石刀，还有大量卜甲、卜骨、小件铜器、大量绿松石块，以及金箔（原报告称为“金页”）和金箔制作的“金花”。这都是王室才会有的财物，看来王室和奴隶们居住的地方相隔并不远。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殷墟王宫区发现有大量集中存放的石头农具，其他任何商代聚落，包括殷墟范围内的，都没有类似发现。这意味着在王室之外，各商人族邑并不采用标准的“奴隶制”劳动形式，而是由各家农奴自己制备农具。

那么为何只有王室使用这种野蛮且低效的生产方式？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在以“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中，商王朝内部的阶级差异和族群差异往往混杂在一起。都城及周边是商族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但也会有各种来历的贱民部族，以及商人贵族拥有的奴

隶。这些奴隶来自边地战俘，随时会被用来献祭，只是我们还很难确定奴隶所占的人口比例有多少。

离开都城越远，各地土著人群和商人的语言、风俗差异就越大。他们多数被本地的商人宗族统治，属于人身权受限制的农奴。在商朝势力的外围，土著人群开始有自己的首领和部落组织，他们往往要接受邻近的商人侯国的统治，为侯国缴纳贡赋和服劳役。

这些异族首领，被称为“伯”，甲骨文写作，其来历不详，和“百”音形近似，有可能是商人习惯认为异族头领都是百人规模的领导，但实际上也有大得多的，堪称“方国之君”。

“伯”并非商族人。比如，甲骨卜辞中常出现的“羌方伯”，指的就是羌人方国的首领。周族的首领，则是“周方伯”。《史记》记载，周文王曾被商纣王任命为“西伯”。这个称呼是有所依据的，只不过在周灭商后，后人已不了解“伯”在商文化中的意义了。

异族方伯不一定臣服于商朝，有些还自恃险远，长期和商朝敌对。商朝亦经常征伐这种异族方国，并用捉获的方伯首领献祭，尤其在殷商后期，商王对此更是重视。可能商王认为，人牲的地位越高，作为祭品的价值就越高。

甲骨卜辞显示，长寿的武丁王经常亲征异族地区，特别是西部的羌人（今山西和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并用羌俘献祭。武丁王的卜辞经常记载献祭人牲的数量，相比之下，武丁之后的八位商王都没有这么活跃，这很可能是因为那时的献祭人牲已越来越

越依靠边地的侯或 者臣服的伯来提供。但亲征异族一直是商王的荣耀之举，每一位商王 都必须履行，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王者。

商王有一种军事征伐的仪式，名“步、甲骨文写作：𠂔，字 面意思是步行，可能是指商王全副武装带领部队行军。甲骨卜辞中有 大量王“步”的记载。在殷都时代，商王行猎或出征一般会乘坐马车， 但“步”这种古老而威严的仪式一直存在。

在少数情况下，比如身体不适，商王会指定某个贵族代替自己 履行“步”的仪式。卜辞中从来没有其他人自行“步”的记录。在 周族崛起时，周人也学习了 “步”的仪式，比如，有些文献就记载 过周武王“步”而行军，和甲骨卜辞很相似：“王乃步自于周，征伐 商王纣。”（《逸周书·世俘》）

被异族同化及传统沦丧的危险

凭借独步天下的青铜技术，早商王朝曾经扩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长江畔的盘龙城商城；但早商的迅猛扩张，也蕴 含着未知的风险。

军事上，远方的殖民城邦虽然可能足以自保，但毕竟和王朝腹地 山河悬隔，身处异族土著的包围之中，由此，商人征服者难免和当地 人互相侵染、同化，从而丢掉商人的精神内核——勇武和人祭宗教， 甚至接受诡异的异族宗教。这是盘龙城发生过的教训。更不可容忍的 是，南土的异族文化还向郑州都城倒流，污染商朝王室，引发了王朝 内战——九世之乱。外来精神污染虽然最终被肃清，但早商的扩张成 果也大半化为泡影。

商朝不可能被武力摧毁，却可能会因异族熏染而堕落。如何维持地跨千里的广域王朝，让商族保持自己的高贵特性，是早商时代留下的命题。对此，除了前文所述及的马车技术，武丁王还需要用其他手段保持商王朝的文化特质，避免被异族腐蚀。

早商不仅疆域过大，殖民城邑前出太远，而且王权也过于发达，其标志就是郑州和偃师商城庞大的城池与仓储体系。这就需要职业化官僚团队，而“职业”则意味着脱离原生态的宗族生活，只对雇主，也就是商王负责，从而丧失传统文化特质。

早商王权还改变了商人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偃师和郑州这两座庞大的城池。传统的商人宗族共同体和城市生活存在矛盾，城内宗族只能放弃旧有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兼营的自足模式，成为王权游戏规则中更为专业化的人群。这是商人传统精神沦丧的起点。

在王权和官僚体系主导的社会规则中，倘若某位商王突发奇想，要放弃传统的人祭宗教，就像郑州商城晚期曾经发生的一幕，那么，唯命是从的官僚体系是难以起到纠正作用的——它只能充当王的工具。幸运的是，郑州最发达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都在城外，它们所代表的群体才是商人传统的保存者，并在内战中挫败了城内欲废人祭的“改革派”。商族传统精神离不开那些分散而自治的商人族邑，就像美国的白人精神离不开南方种植园的“红脖子”一样。

经过九世之乱，当盘庚迁都殷地，开始建造庞大的洹北商城，历史似乎要复制早商时代的循环。但武丁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转而放弃洹北商城的营建，让各商人族邑自行其是，自由发

展，以维持商族旧有的小共同体社会结构和传统部族生活方式。由此，商人的宗教文化才能得到维护和传承。

盘龙城 的腐化，以及它引发的郑州商城朝廷对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武丁王的警钟。或者说，武丁的主要政策都源自对早商朝廷崩溃的反思。

哪怕获得了马车这种新的统治技术，武丁王也尽量把疆域保持在可控的安全规模内。过大的疆域会包含太多各色异族，而这会稀释商族人口，从而带来诸多风险。武丁虽然四面出击，开疆拓土，但他尽量稳定地推进商朝的势力范围，不做盘龙城那样遥远的跳棋式布局。王朝统治的异族不需要太多，关键是献给诸神的祭品要足够。

武丁的扩张战争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祭典礼。那些异族俘虏本可以作为劳作的奴隶，但人祭宗教是商王朝的精神支柱和商族获得诸神眷顾的根源，所以，舍弃一点现实的物质利益，也要取悦诸神，维护商文化的兴旺。

武丁王奠定了殷都的布局和之后二百年殷商文化的基调，其陵墓虽然已经被毁弃，无法确认，但他的夫人妇好的墓穴却被完整地发掘，由此，现代人亦可以见识商代王室生活之一斑。

注释

1 《尚书·召诰》，它虽然是周人的文献，但体系是商人理念的延续。

- 2 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第312页。
- 3 字形摹写及隶定来自李宗焜《甲骨文字编》，中华书局，2012年。
- 4 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3期。
- 5 张光直：《商文明》。

6 《英藏》150正：“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

7 《粹》597：“王乍（作）三自（师），右、中、左。”

- 8 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第722页。

- 9 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2019年第6期。

- 10 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第722页。

第十二章 王后的社交圈

游客走进安阳殷墟博物苑（宫殿宗庙区）的大门，向左转，能遥遥看到一位女子的大理石像，手执铜钺，全身戎装，站立在自己墓穴的展示厅旁边。她就是武丁王的夫人妇好。

1976年，妇好墓被发掘出土，殷商王族的生活由此首次完整地展示在现代人眼前。商王陵区的墓葬大都被严重破坏，但位于宫殿区西南侧的妇好墓却躲过了各种盗墓者的探寻，保存得非常完整。在武丁王的甲骨卜辞里，经常出现妇好的身影，故而，这位殷商王后的生前身后事，有很多可以讲述。

侥幸保全的王后墓

殷都王宫区西侧，是阻河溢出的湖沼。湖沼的西南有一片略微高起的台地，在武丁王营建新王宫时，这里也出现了繁荣的聚落。它距离王宫只有200米，在这里安家的人，肯定和王室关系密切。这应该就是妇好的家族，她死后也埋葬在了这里。

妇好墓，长方形墓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发掘时，墓穴底部已经被地下水浸泡，很多随葬品和骨骸是从泥水中捞出的。共用16人殉葬，墓穴底部的腰坑埋有一人，椁内、棺外埋有八人，椁室顶部埋有四人，墓穴壁龛埋有三人。此外，还有殉狗六只。妇好本人的尸骨已经完全腐蚀不见」在商代墓葬中，这比较常见，很可能是受铺撒的朱砂腐蚀所致。

随葬品保存得非常完整，共有1928件，其中，铜器、玉器和骨器都各有数百件，铜器总重量达3250斤。很多铜器上有铭文“妇好”字样，直接证明了墓主的身份。还有铭文“后母辛”：“辛”是妇好

的 生日，用天干日起名是商人的习俗；“后母”，则是她为商王生育过 子女后获得的尊称。

在铜礼器中，仅鼎就有31件，最大的是一对青铜方鼎，高80厘米，重量分别是256斤和235斤。至于商人最重视的酒器，则有铜觚53件，铜爵40件，还有各种盂、觥、壶、斗、瞿、卤、罐等。比较独特的炊器是一件三联赢，它与烧水的底座是一体的，上面有三个可以单独取下的蒸锅（甑）。还有一件“偶方彝”，表面铸有鸟形、夔龙纹，以及长鼻大耳的象头，器物整体像一座殿堂，顶盖如“两面坡”式屋顶，



偶方彝



三联就



双虎食人头大钺

下方有屋椽头造型，底座形似房屋的台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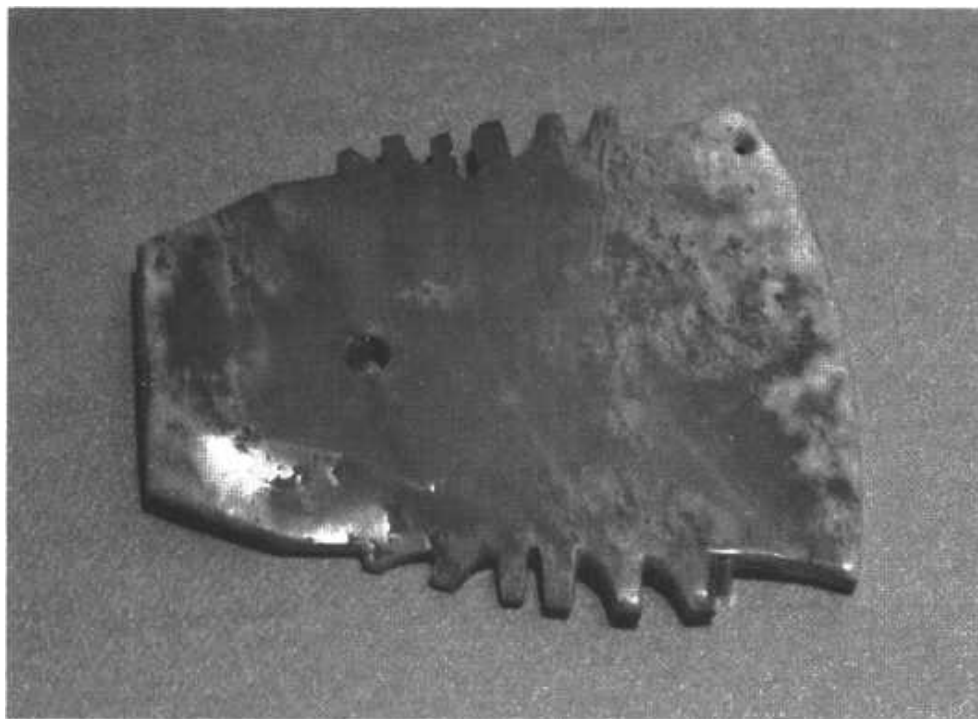
早商和中商时代，铜器表面的纹饰很少；但到妇好时代，青铜器表面开始铸满纹饰，显示了殷商时代的艺术和技术的提升。

妇好也是军事统帅，随葬的青铜兵器有钺四把，戈91件，钺57枚，其中的两件大铜钺有“妇好”铭文，一件有双虎食人头花纹，重18斤；一件有龙纹，重17斤。加上木柄，这两把铜钺都会超过20斤，显然礼仪性更强，并不适合做实战兵器。两件小钺铸有“亚启”铭文，属于实用兵器。部分铜戈体型轻薄，是专门用以陪葬的低成本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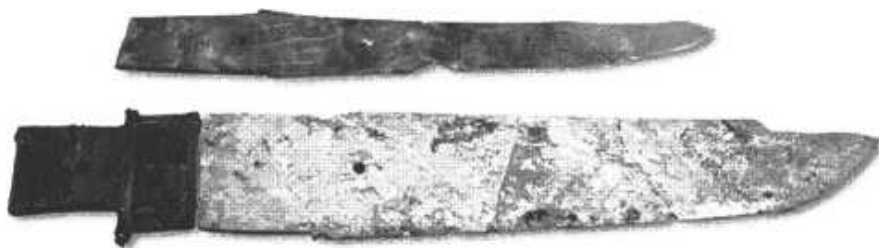
玉器中也有兵器，其中玉戈39件，玉戚九件。玉戚的造型接近钺，可能是为了增加新意（和铜钺造型有所区别），商人在其两侧增加了若干道须状装饰。有两件“玉援铜内戈”，用玉作刃部，铜作尾部。这些玉兵器的用途主要是仪式性的。

还有一件玉扳指，表面有容纳弓弦的细槽，还有钻孔用来穿绳携带，便于戴在大拇指上拉弓开弦，属于实战兵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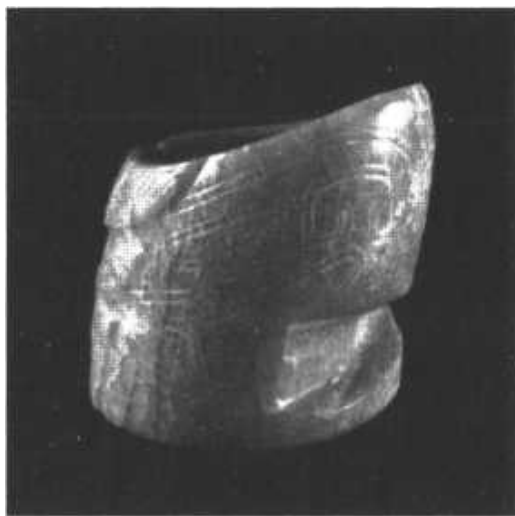
此外，玉器还有大量璧、玦、璜、琮。有些玦和璜做成了龙虎等艺术造型。玉琮则保持着良渚文化的基本形状，也有些出现了变异，如边缘造出扉棱。和良渚古国时期的经典玉琮（瑶山、反山墓葬）相比，妇好墓的琮形体要小一些，也没有了良渚古国的经典神人兽面纹饰——只有一件还有良渚兽面纹的简化遗留（编号1003），但也有了较大变化，比如兽面出现在玉琮的平面上，而良渚兽面占据的是棱角的两侧。



玉戚



玉援铜内戈



妇好墓玉扳指



玉琮（编号

1003 ）

商文化和良渚文化到底有多少联系？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毕竟，从良渚文化结束到商朝建立，中间有七百多年，到妇好时代，则是一千年。但妇好墓中出土的这些玉琮，却又似乎暗示着某些可能性。

作为女性，妇好的墓中还有玉梳两件，以及大量束发的笄，其中玉笄28枚，骨笄499枚，笄的顶部多雕有鸟、夔龙或人形。纺织工具则有玉纺轮22件。此外，还有大量玉质动物形小刻刀和动物造型青铜尺，也和女红织纫工作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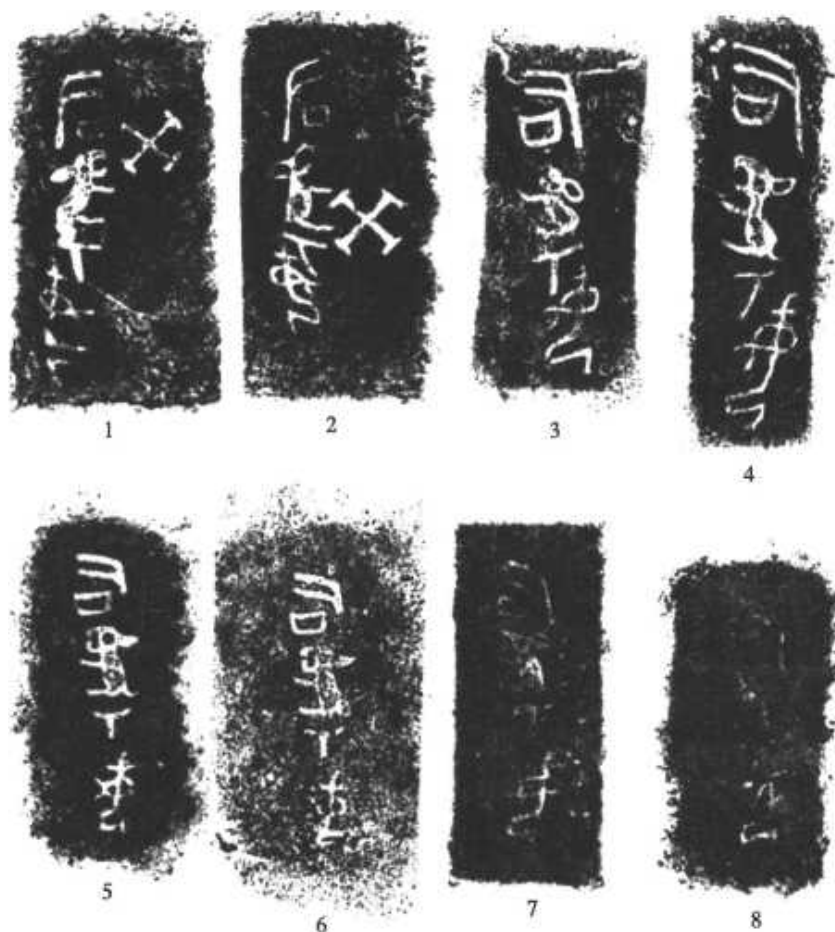
妇好墓还出土有六件铜制“弓形器”。考古学者起初不知道这种器物的用途，后来发现它总是和马车一起出现，于是推断，它应当是挂在驭者腰前用来系挂缰绳的车马器。看来妇好本人至少拥有六辆马车。此外，墓中还随葬一对小型玉马雕塑。

除上述礼器、兵器和饰物，墓中还有各种质地的工具，比如，铜制的斧、凿、铸、锯、铲、镰、小刀、簸箕，以及“多钩形器”和“双角形器”（这可能是挂物品用的）；石制的，则有铲、锤、杵、磨石等。

妇好墓有大量玉石雕塑工艺品，如玉雕的容器（礼器）簋^①。玉饰体型都很小，属于日常的玩物，或者缀在纺织品上的装饰。有些人和动物雕像是三维立体造型，发掘报告称之为“圆雕”，这在殷商之前比较少见。

玉器中还有一对杵和臼，臼直径约30厘米，杵长28厘米，应该是研磨朱砂颜料用的，纹理中渗入了朱红色，研磨面非常光润。下葬时，这套杵臼是分离的，玉杵放在椁内，臼则是在墓穴上层的填土中发现的。它们应当不是制作日常化妆品的用具，因为体型比较大，位置离墓主也比较远。商人崇尚红色，在某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和战争，人们可能会在脸上涂抹朱红色。这套杵臼应该为妇好的部下提供朱砂染料之用。

商人是用热带海洋的货贝做钱币的，妇好墓内一共发现了6880枚货贝。这些货贝都放在棺材内的墓主腰间位置，说明货贝是墓主人去往天界时最重要的财物，一定要随身携带。



“后善母”铭文拓片

墓中的铜器铭文，除了“妇好”和“后母辛”，还有一种是“后等母”。发掘报告认为，萼也是妇好的名。其他铜器铭文，则还有“亚其”“子束泉”等人名。他们可能是妇好的亲人或同僚，把自己的铜器赠送给了妇好。

和王陵的对比

王陵的规格比妇好墓大得多。仅从墓穴面积来说，王陵大墓边长多在20米左右，墓穴底部面积也会超过100平方米，而妇好墓仅接近40平方米（7米X5.6米），要小很多，而且也没有墓道。王陵内发现的殉人动辄过百，甚至数百（这还是被破坏之后的残余），妇好墓

则只有16人，相差很多。可以想象，如果王陵区大墓没有被破坏，随葬品肯定比妇好墓丰富华贵得多。

王陵大墓劫余的文物，有些和妇好墓类似。比如石雕，M1001出土有蹲坐石兽（虎首人身）像、石枘；M1500出土有石龙、石牛和石虎各一对。它们的造型和妇好墓中的玉石雕塑有些类似，但体型较大，长度为三四十厘米。这种石雕工艺品在后世的西周和春秋亦很少见。

妇好墓出土铜戈91件，王陵区的随葬兵器规模则更大。比如，M1004大墓出土铜盔超过100件（已全部破碎），铜戈72件（多数带约1米长的木柄），铜矛头731件；M1001大墓盗掘后的填土出土骨钺6583枚。这些是破坏后的残余，不代表完整数字，更可见王陵大墓之豪奢。²

此外，王陵区的M160并非商王墓葬，它比各商王墓的规模小得多，著名的“后（司）母戊”大鼎，便是当地村民1939年在此墓盗挖出土。有学者据此推测，它应当是武丁王的另一位王后“妇娣”的墓。

M160只有一条墓道，1984年发掘时，发现殉38人，比妇好墓多一倍以上；³“后母戊”大鼎重达1600多斤，而妇好墓中最大的方鼎仅重256斤。对比可见，这位“后母戊”的墓葬规格比妇好要高很多。至于原因，可能是妇娣死得较晚，彼时殷商国力已经更为强大，或者妇娣之子可能成了王储或下一代商王，所以她的墓葬要更豪华。

商王夫妻的生活